新观察

动物叙事的新变与独特价值

□陈佳冀

当代的“动物叙事”以人与动物的生命关系为叙事核心，聚焦非人类生命主体性与存在价值，并通过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纠葛与情感联结，来回应现代性进程中人类所面临的价值危机与精神困境。它既不同于传统寓言书写中动物的符号化运用，也有别于儿童文学中常见的拟人化修辞，而是依托独特的动物话语方式，立足民族生活与生命经验，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作家的现实思索



在当代中国的文学版图上，一股以动物为叙述核心的创作潮流已蔚为大观。从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到杨志军的《藏獒》，从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到王松的《双驴记》，从次仁罗布的《放生羊》到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黑焰》……动物叙事成为新时期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颇为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之一。我这里所说的“动物叙事”，是指以人与动物的生命关系为叙事核心，聚焦非人类生命主体性与存在价值，并通过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纠葛与情感联结，来回应现代性进程中人类所面临的价值危机与精神困境的一种叙事类型。它既不同于传统寓言书写中动物的符号化运用，也有别于儿童文学中常见的拟人化修辞，而是依托独特的动物话语方式，立足民族生活与生命经验，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作家的现实思索，从而为当代文学创作注入鲜活而持久的生命力。

传统根脉与外来镜鉴：当代动物叙事的生成语境

这股创作热潮并非偶然，而是在传统积淀、西方影响与时代境遇三重维度的合力作用下应运而生。

中国古代有关动物的伦理思想源远流长。譬如，道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思想，揭示了天人不相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儒家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道德关怀从人际扩展到了整个生命世界。从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到宋明理学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始终保持着一条超越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血脉。佛家东传后，“众生平等”“戒杀护生”的理念与本土“物老成精”等民间信仰相融合，将一种尊重生命、慈悲为怀的伦理态度内化为中国人的生命体验与精神传统。这些思想资源蕴含着丰厚的生态智慧与和谐理念，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为中国当代动物叙事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工具理性传统的伦理根基与精神依归。

20世纪兴起的西方动物解放思潮，不仅为世界范围内的动物叙事开辟了新的话语空间，也为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参照。从彼得·辛格《动物解放》中“一切动物均为平等”的主张，到汤姆·里根对动物生存权利的论证，再到玛莎·努斯鲍姆、唐娜·哈拉维、凯瑞·沃尔夫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动物权利”“人与动物之关系”的拓展……这些理论资源极大地丰富了当代动物叙事的理论基础，也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塑造了中国作家的创作视野。当然，这种影响更多体现为一种时代性的思想氛围和问题意识的共振，中国作家并未简单移植这些理论，而是将其与本土“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相融汇，在对话中生发出具有自身脉络的叙事路径。

更为关键的是，在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挑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经历着结构性重塑。随着生态保护实践的广泛推进、生态保护意识的深入人心，作家们对于动物叙事、对于人与动物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因此，当“人类世”的困境正在叩问着我们每一个人时，中国当代作家给出的回应是：敞开胸怀面对世界性的思潮，同时回到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答案。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一场深刻的对话由此展开，叙事范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主体觉醒与视角革新：动物叙事的伦理范式转型

无论是乌热尔图笔下鄂温克森林中那头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公鹿，还是陈应松笔下神农架深处那只孤独起舞的豹子，抑或王松笔下那两头以自焚完成终极反抗的黑驴，这些当代叙事中的动物形象，与传统书写中的动物已判然有别。自先秦早期动物寓言，到以《诗经》比兴为代表的诗歌传统，再到魏晋志怪、唐宋传奇直至明清小说，动物始终以“文化生命”的姿态发挥着叙事载体与道德寓意的功能。而在当代作家的笔下，动物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它们不再是道德说教的符号，也不再是伦理规训的媒介，而是拥有独立情感、意志与尊严的生命实体。正如张炜在《三想》中所言，人与动物之间“不是高级动物与低级动物的关系，更不是人与动物的关系，甚至也不是一种动物与另一种动物的关系，而是地球上的一种生命与另一种生命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平等”。这种平等，正是当代动物叙事伦理变革的起点。具体而言，这一转变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动物形象实现了从“转喻型”到“拟实型”的根本变革。所谓“转喻型”，指动物主要作为意义的载体，服务于人性议题的象征性表达，属于“以兽喻人”的叙事传统；而“拟实型”则意味着作家致力于还原并再现动物作为生命本体的真实面貌，赋予其不可化约的生命价值。在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中，那头雄壮的公鹿不再是猎人的附庸，而成为鄂温克民族精神的象征。杨志军的《藏獒》中，“冈日森格”以忠诚、勇敢与智慧成为青藏高原精神的生动写照，其个体生命的终结也喻示着传统草原秩序的改变。郭雪波的《银狐》中，银狐“姹干·乌妮格”的生存抗争，则映照着人类寻找精神家园时的挣扎与希冀。这些动物形象的塑造，使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动物与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获得更为丰富的表达，非人类生命本身逐渐成为被发现的主体性存在。它们在各自的文本语境中展现出不同的生命特质：有的坚韧不拔、锲而不舍，有的勇敢机智、威猛无畏，有的友好忠诚、情感丰富，有的纯净通透、率真质朴。作家在创作中着力渲染和塑造动物的情绪与性格，使其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由此展现出蓬勃的生命活力。

其二，叙事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翻转，由“人看动物”转向“动物观人”。很多当代作家转而采用动物视角作为主叙述视角，以非人类的感知方式观察、体悟人类世界。这种间离效果使叙事获得了独特的批判锋芒与伦理反思空间。迟子建的《越过云层的晴朗》以一条大黄狗的视角展开叙述。它虽通晓人事，却并不懂得“文革”给主人带来的精神创伤，只记得日常相处中的温馨与善意。这种“局外人”的目光温润地弱化了历史的沉重，叙述笔调随之轻快舒展，让读者获得了不同于一般伤痕文学的审美体验。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则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小说通篇以豹子“斧头”的第一人称展开。在神农架，它以一种全然非人的目光打量着那个野蛮而破碎的世界。这种视角赋予叙事一种近乎残酷的清醒——当人类与动物的生命空间已无路可退，孤独的豹子便成了这个时代最后的见证者与言说者。莫言的《生死疲劳》更将这一手法推向极致。小说以西门闹的六道轮回为主轴，让其先后化身为驴、牛、猪、狗等动物，每一世都以动物之身审视乡村历史与人性变迁。动物之躯与人的记忆重叠在同一个角色身上，使小说在荒诞中抵达真实，于戏谑中完成了对历史与命运的深沉叩问。

其三，在伦理模式上，当代动物叙事拓展出更为复杂的道德困境与思考空间。赋予动物以生命尊严，这只是叙事的起点。真正复杂的地方在于，当动物化身为一面映照人性的镜子，人与动物的相遇便不再止步于温情脉脉的和谐共处，而是不可避免地转向对人性溃败的审视，乃至对文明本身的追问。陈应松的《太平狗》中，忠犬“太平”历尽磨难瘸着一条腿回到故乡，它的主人程大种却永远留在了城市——狗回去了，人回不去，这一事实本身就构成了残酷的对照。笛安《莉莉》中的母狮莉莉，半生的飘零与困惑，何尝不是现代人精神处境的隐喻？它在原始野性与人类情感之间游移，映照出我们在文明与本能之间永恒的摇摆。王松《双驴记》中黑七以自焚完成的终极反抗，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中老黄牛面对死亡时的平静从容……这些作品都把人物推入无从逃避的伦理困境。无论人还是动物，都被置于选择的夹缝里，无法以现成的善恶标准简单裁断。而镜子所照见的，不只是个体的道德困境。当现代性浪潮不断冲刷着民族的文化根基，动物便成为承载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媒介。乌热尔图笔下的公鹿与驯鹿，阿来笔下的鹰与蛇，郭雪波笔下的银狐与苍狼……这些深植于民族民间土壤的动物形象，映现出文化根脉的断裂与坚守。

去符号化的形象塑造、视角的翻转，以及伦理困境的深度开掘，这三个层面共同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人与动物的关系，正从“人与物”的支配逻辑，转向“他者与我”的伦理相遇。这种转向，让文学获得了深度介入当代精神危机的叙事能力，也使动物叙事从一种题材类型，升华为具有伦理实践意义的文学品格。

生命共情与文明互鉴：动物叙事的多维价值及世界面向

正是这种以动物为主体的叙事转向，使当代动物叙事获得了超越文学本身的多重价值。首先，从文学自身层面看，这些作品通过对动物生命的伦理关怀、对人心的唤醒，以及对理想民族性格的塑造，深度介入现实生活与精神处境。譬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黑焰》、陈应松的《豹》等长篇小说，阿来的《蘑菇圈》、王松的《红骆驼》等中篇小说，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恳求》、次仁罗布的《放生羊》等短篇小说，共同构成兼具民族根脉与世界眼光的叙事谱系，为中国文学参与全球伦理话语的建构提供了扎实的文本支撑。

其次，就社会价值而言，当读者在跨越物种的情感共鸣中重新感知生命的重量，其对自身的理解、对他者在世界中位置的认知，都在悄然改变。当代动物叙事从生态伦理层面看，是对“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文学回应。它通过赋予动物以主体性，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习惯，促使读者在情感共鸣中反思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动物不再只是被书写的对象，而是与人共同构成了叙事的主体。这样一种写作实践，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情感认同基础。同时，它也是对现代性精神困境的深度疗愈。在技术理性日益膨胀、人与自然日益疏离的今天，这些故事通过呈现人与动物之间的真挚情感，唤醒人类被物质主义遮蔽的良知与善性，为迷失的现代心灵寻找精神家园提供了宝贵的叙事参照与情感慰藉。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可简化的多重的、错综复杂的、可以被重塑的关系。”

从更宏阔的视野看，植根于“天人合一”传统与“万物有灵”信仰的中国动物叙事，正以其独特的地方性知识回应全球性的生态困境，为世界文学贡献不可替代的中国经验与伦理智慧。乌热尔图、阿来、石舒清等作家深植于民族民间土壤的创作，以各具特色的方式将中国的传统生态智慧呈现于世界面前。从灿烂的文明和悠久的文脉中开掘资源、汲取营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构建具备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动物叙事话语体系，中国动物叙事必将在世界文学版图上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为全球动物叙事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当然，中国当代动物叙事仍处在探索与生长之中。也正因如此，这一叙事类型才值得我们持续投以深切的关注与期待。

［作者系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文系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谱系建构研究（1979–2023）”的阶段性成果］

■短　评

语言的深潜与生命的洄游

——评道辉诗集《白鲸漫游》

□唐晓渡

阅读道辉的新诗集《白鲸漫游》时，我很好奇：道辉为什么会使用“白鲸”这个意象？白鲸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一是白鲸喜欢玩耍，具有很强的游戏性；二是白鲸能发出种类繁多、变化多端的声音，是海洋里的“口技专家”。这代表白鲸既渴望交流，又喜欢自我娱乐。这或许与道辉的诗歌创作状态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这么多年来，道辉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语言探索。这种探索背后，又暗含着更为深邃的生命意识。

道辉属于为数不多的努力实践自己的诗学观念，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有所溢出的诗人。当代诗人，尤其是先锋诗人，更容易沉迷于对观念的兴趣。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大量外国哲学、文学、心理学思潮的涌入，选择某一足够“时髦”的观念以为标榜或装饰，可谓一时风气。但很多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主张之间其实是“油水分离”的，有的甚至出现悖谬的情况。而道辉的诗歌从一开始就与他对个体生命存在和诗歌语言本质的真实探询、领悟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不仅自己在坚持，还以此影响、感召一群意气相投、志同道合的朋友。这表明了其诗歌主张的旺盛活力。

道辉的诗歌，经常会关注那些沉默的事物。比如诗集《白鲸漫游》中的第一首诗《走回大地的人》。“大地”在诗歌里本来就是最原始，也是最坚实、最稳固的意象。在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里，大地甚至是一切诗意和活力的来源。我注意到，在《走回大地的人》里，“黎明”差不多成了一个动词。更准确地说，一个客体被主体化了。他写道：“黎明不是天平的高举者，黎明是黎明之窗的敲窗者。”黎明相对于黑暗而存在，与希望、摆脱困境等寓意有关，而道辉的处理很有意思，突破了一般的物理或智力认知。诗作的下一句是“那是从昏暗中走回大地的人”。我想到的就是向死而生，这是一个先行到死亡中去而又折回的人，正是他带来了“黎明”的词性和词义的变化，而这样的变化只能来自内在眼光的变化。只有那些对生死关系真正有所参悟的人，才有能力从这黑洞里返回，并回馈世界以新的眼光、新的态度和新的语言。这就可以看出道辉的感知方式和语言方式。他努力跳出语言的惯性，呈现其更具原初意味的魅力。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本书的书名《白鲸漫游》。一个体态硕大的存在，在浩瀚无涯的大海里优哉游哉，何其令人心醉神迷，却也不排除危险的重重阴影。大海不但大，还深，最深的有一万多米。那里已经看不到光，因此，不再有绮丽的风光，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而且，黑暗里有回流，有暗潮，有巨大的漩涡，有莫名的水怪，有不知何时爆发的火山，总之隐藏着各种狂暴之力。其不可测度，毫不逊色于海面骤起的风暴。我们的生存状态和语言状态，其深处是不是也像大海一样？道辉有一首写海的诗，说得很有意思：“别解开绳索，大海从不给你回应”，然后是“静静的海面，真想伸手掀开”。但没有人能把大海掀开。道辉有这样的冲动，但也仅仅是一种念头而已。这里暗示了写作的边界，但也暗示了诱惑的来处，包括其写作的指向。而更大的问题在于，真能掀开又怎样？循此我们只能再次回到沉默和不可测度。

道辉的诗歌让很多日常生活意象，产生了丰富的诗意。《两根火柴》中，诗人写到了火柴“滋滋的叫声”，也写到了那些“只领回打孔的船票”的人。他写“在你面前此岸彼岸是两根擦不燃的火柴棒，继续擦呀”。这就充满了对生活的隐喻。在一些诗作中，诗人使用了“沙漏”的意象，还写到“缝补沙漏”的动作。沙漏和时间有关，既用来计时，也表示时间的流逝，而时间的流逝也意味着死亡的逼近。但是，为什么要“缝补沙漏”呢？这徒劳的努力真的只是徒劳吗？它和“继续擦亮”又是什么关系？在这些维度上，道辉的诗体现出了一定的哲思。

和诗歌打了半辈子的交道，我总在思考：人类为什么要写诗？在很多人看来，诗现在好像越来越显得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但我们内心都知道，诗是这个世界、这个文明不可或缺的构成。为什么不可或缺？我们的写作和阅读行为本身就是回答，还将一直回答下去。道辉经常举办诗歌阅读活动。他希望通过阅读和讨论，不断返回我们自身的写作，不断回到我们自身对诗歌、对语言、对这个世界的重新思考。我当年写过一篇文章叫《不断重临的起点》，目的是不断地提醒，要回到那些最根本的问题：诗是什么？诗的语言意味着什么？如此等等。当然，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一两句话来回答，比如“追求本真的存在”等。但这样的回答可能会沦为“正确的废话”“熟滥的真理”。所以，关键还是要回到具体的诗歌实践。譬如，如何安顿每一行诗句、每一个意象，乃至每一个标点、每一处空白……阅读《白鲸漫游》时，这些本源性的问题再次来到我的面前。我想，所有的问题都得靠我们自己去寻求回答，而且可能没有终极的答案。

（作者系诗歌评论家、作家出版社编审）

坚持“两个结合”，在文脉传承中开拓新时代文学新境界

（上接第1版）

守正创新，让中华价值理念与当代创造相融

在新疆作协主席刘亮程的故乡，《记住乡愁》第十季的镜头记录下了他对乡土的深切眷恋。书写乡土几十年，在他看来，“家乡是跟我们血肉相连的那个地方，回到家乡，你便知道自己是谁了”。这份对故土的深情，与文学对文脉的守护同声相应。

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缘起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殷切期许——“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由郭文斌担任文字统筹、撰稿，冯骥才担任文学顾问的主创团队努力下，节目希望通过寻根中国乡土、梳理文化脉络的方式，将中华文化的精神密码转化为一个个打动人心的故事，唤起海内外华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切体认。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题材与写作素材，那些曾在典籍中沉睡的句子、在民间流传的技艺、在山川间留下的名字，在今天的创作中重获了真正的呼吸。广大作家将中华价值理念与当代创造相融，让中华美学对接当下审美，以万千笔墨铺展新时代文脉赓续的壮阔画卷。

五年来，中国作协引导广大作家从中华文明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挖掘创作素材，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在守正创新的艺术实践中生动展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价值理想与审美旨趣。不同题材、不同体裁的文学创作百花竞放，传统文化资源在其中被不断唤醒。

悠远历史是文学最厚重的矿藏。无数作家沉心打捞文明记忆，接续史诗传统与文人风骨，回望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流。王尧的《桃花坞》、温燕霞的《破阵子》、房伟的《石头城》、叶梅的《神女》等作品，从不同侧面书写烽火岁月中的不屈坚守，见证文化根脉在危难之际的韧性与力量。毕淑敏的《昆仑约定》、次仁罗布的《乌思藏风云》、张者的《天边》、范稳的《青云梯》、党益民的《天牧》、阿舍的《阿娜河畔》等作品，书写雪域、丝路、西南边陲雄浑的奋斗史诗，生动呈现多民族一体共生、文脉同根的历史底蕴。张锐锋的《古灵魂》以三晋古史为线索溯源中华文明，在他看来，“这是一次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探源，也是向古代先贤们的智慧、创造和牺牲致敬”。

城市是文脉最具体可感的形态之一。近年来，“为城市立传”渐成一股写作热潮。蒋蓝的《成都传》梳理成都千年城史与蜀地文脉，范小青的《家在古城》将苏州古城保护40年的历程与个人记忆交织在一起，“丝路百城传”系列更把这一热潮推向规模化、工程化，让城市从抽象的地名化为可感可知的文化人格。古城被如此深情地凝视，正说明传统从未远离当下，而是等待着被作家书写和记取。

非遗技艺与传统工艺是文脉落在实处的具体依托。许多作家将目光投向这些沉淀匠心的文明遗存，以文字为器物和手艺立传存照。李清源的《窑变》、葛亮的《鹤舂行》、王芸的《日光窑月光瓷》等作品，在泥火、釉色、刀笔之间书写手艺的代代传续、匠人的心性持守，将器物之美与手艺人的匠心升华为中国人温润自持的人文品格。汤素兰的《绣虎少年》、唐明的《惹木与蓝》、邓西的《永远的阿贝》、沐清雨的《星回故里》等作品以非遗纺织刺绣技艺为叙事核心，留存民族鲜活的审美记忆。

持续升温的考古热、博物馆热，也为文学开辟出新的书写空间。作家走向洞窟、考古工地与馆藏文物，让静默的遗存经由文字重获生机。刘醒龙的《听漏》、海漉的《时空画师》、李姗姗的《器成千年》《青铜神树》等作品，追踪上古青铜、传世古画背后的文化故事，替不会开口的文物发声，将深埋土层、封存馆阁的文明碎片接入中华文明代代赓续的长卷之中。

民间故事和礼俗风物中同样藏着文脉最朴素的根基。长期投身城市历史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工作的冯骥才，始终把守护中华文脉当作自觉的文化使命。他的《俗世奇人》系列以笔记短章接续志人传奇古典叙事传统，为行将消散的市井行当、民间技艺留存精神剪影。刘亮程从“一个人的村庄”写到“一个民族的厚土长命”，其新作《长命》在现代化进程中探寻精神根脉的传承与安顿，为当代文学如何回应文化传承这一命题提供了富有启示的创作实践。郭文斌通过《中国之美》等作品，持续探索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创作、生活深度对接。在他看来，作家应该用文学作品礼敬中华文明，“重视文化的积淀与传承，在赓续文脉中服务时代，在时代发展中绽放文学魅力”。

文脉的传承不仅体现在回望与留存，更有赖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新的叙事形式对接当下读者的精神世界。艾伟的长篇小说《春歌》化用古典戏曲母题，借古老传说叩问现代人的情感世界。杀虫队队员的《十日终焉》把节气、生肖、民俗嵌入新锐叙事，“我希望能以国风元素来唤醒大家对传统文化的真切关注，更希望借助这本书未来的IP转化，让世界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我们现在的生活”。

传统的返场，还以另一种方式发生——从古代典籍与历史人物中重新取材，让沉睡的名字再次开口说话。由中国作协主持、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持续推出《东方圣哲——孔子传》《章回之祖——罗贯中传》等新作；《赤心擎海：郑成功传》等作品相继问世，还原历史人物真实而复杂的生命底色。李敬泽的历史散文集《破空：春秋异客传》追随史家之笔，为那些“破空而来”的春秋人物重新作传，完成了对经典的当代阐释。张锦江历时14年创作的《新说山海经》系列于2026年推出末卷，12卷全部出版完成，以诗意语言重述那些异魅生灵。无论选择何种叙事方式，创作者们共同印证着一条历久弥新的真理：传统沃土越是深厚，文学的创造便越是丰饶。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过往，中国文学走过的每一步，都因有深厚的文明土壤而坚实。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国作协将继续引领广大作家扎根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实践，坚持“两个结合”，持续增强文化原创能力，不断打造出更多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文学精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文学的长河里奔涌不息，绽放恒久璀璨的光华。